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631-05

# 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初探

刘礼堂 祝恒富 解宇

**[摘要]** 考古学发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汉水流域的鄂西北、陕南、豫西南的部分地区,珠江流域的广西左江沿岸的百色地区,存在一种以河床砾石为原料、制作粗犷、器类单一、器形偏大的原始砾石工业,这种原始砾工业与北方原始大石片工业形成鲜明的比照,它代表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长江以南地区,客观存在着一种砾石工业文化。

**[关键词]** 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

**[中图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 一、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的发现与地域分布

考古发现证明,在中国南方有一种有别于北方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学术界称之为砾石工业遗存。这种砾石工业的旧石器遗存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覆盖汉水上中游地区,地理坐标大致为北纬23至34度,东经106至119度。在这一广阔的空间内,按区域文化又可细分为三个文化区:即长江中下游地区、汉水上中游地区和珠江上游地区。在湖北,我们将长江沿岸的这类遗存归入长江中下游地区,汉水流域者归入汉水上中游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指长江沿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全境。这一区域以湖南发现为最多,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这类遗存二百多处遗址和地点,主要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条水系的河谷地带。现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有湖南石门大圣庙、澧县猴儿坡、多宝塔、彭山、张家滩、仙公、皇山岗、澧阳平原的诸地点及澧县北部的一个地点群,另外还有怀化地区的一些考古资料,这批考古资料的旧石器遗存是与新石器遗存一同公布的。湖北这类遗存的发现从时间上比湖南早,但发现的地点不及湖南多,主要是长江沿岸,有大冶石龙头、枝城九道河,当阳烟集九里岗和江陵鸡公山下层;江西发现的有安义潦河、袁水等地;安徽发现的有水阳江、巢湖望城岗等地。

汉水上中游地区:该区域主要发现于鄂西北和陕南的汉水沿岸。在陕南先后公布的发掘简报已有七批:主要是陕西南郑县梁山龙岗一带、以及陕西汉中地区汉水沿岸的11个地点。在鄂西北地区有郧县曲远河口、丹江口水库沿岸40多个地点、汉水中游的襄阳山湾、军营坡、金鸡嘴和龚家洲。另外,在鄂西北的十堰市、郧县和丹江口市博物馆也收藏有大量这种标本。

珠江上游地区:该区也曾多次发现此类遗存,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有百色盆地;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物工作者又发现了86处砾石工业遗存;在广西新洲也发现了2处;最近又在牛坪坡发现了大量遗物。

综上所述,以上三个区域的划分是以自然地理区域划分的,当然,至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至今尚未见到此类遗存的发现,但不能说明,这一区域就没有这类原始的工业遗存。

## 二、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石制品的主要特征

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的石制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如石锤、石砧;第二类如砍石砸器(砾石砍石砸器、石核砍石砸器、石片砍石砸器)、尖状器、石球、刮削器、手斧、盘状器、半月形器等,还有大量的石核、石片。由于第一类工具是制作石器的工具,所以一般较少,在这一类工具中石锤相对要多一些,下面我们仅就上述几种石制品的特征进行大致的归纳。

石球。除广西百色盆地未见石球外,其余二大区均有发现,汉水区不但分布广,且数量大。汉水区的石球原料主要是石英,制作方法有二种:一是将砾石的一部分打去,使之成为球体,另一种方法是用二个砾石相互磕碰,使之成为球体。长江区的石球之原料多为石英岩,它是通过周身打片,使之成为球体。石球有大小之分,这可能与使用有关。

砍砸器。砍砸器可分为砾石砍砸器、石片砍砸器和石核砸器。所谓的砾石砍砸器是利用一块大小适中、或圆或扁的砾石,通过对其一侧或一边进行打击,在打下数量不等的几块石片后,有的对其阴面与砾石面所形成较锐利的边缘进行第二步加工,有的则不然。石片砍砸器,其一般较厚大,形状以扇形多见,其它形状如多边形,不规则形均较少。石片砍砸器在湖南西部的澧水流域较多,在其它二区砾石砍砸器远多于石片砍砸器。砍砸器的刃缘一般较曲折,以弧刃多见,凸弧、凹弧、直刃、平刃也有一定量。单面加工的比例高于二面加工。加工方法以正向和反向为主。

刮削器。刮削器占整个石制品的比例较小。其一般由石片或断块制成。有单刃和双刃之分,多刃者极少。单刃中有单直刃、凸刃、凹刃。加工方法与砍砸器较近似。刮削器器型相对较小,制作相对精致。

盘状器和半月形器。主要见于湖南,广西百色地区虽有考古简报,但与湖南相比较二者尚有差异。湖南盘状器的制作方法是将一块大石片,对周边进行打击,使之呈圆饼状或椭圆形。周边为刃,有的对刃部进行第二步加工。所谓的半月形器应是盘状器的一半,它可能是一种固定的器形,而不是有些考古专家推断“可能是盘状器的残件”的推测。这种石器出现较晚,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

尖状器。可分为砾石尖状器和石片尖状器,从形态上可分为三棱尖状器和扁尖尖状器。一般以砾石加工成的为三棱尖状器,扁尖者有之但较少,而以石片加工成器者则都是扁尖状器。根据尖部的形态又可分为正尖尖状器和歪尖尖状器,正尖的数量略大于歪尖者。扁尖尖状器与三棱尖状器在制作方法上有所不同,三棱尖状器一般是在砾石的二侧,由外向里打击,使中部(因二侧石片的尾端相连)形成凸棱,再将二侧加工成刃。而扁尖尖状器是先将砾石劈开,取砾石的一部分,再进行加工或是将砾石二侧的原始面打掉再进行加工。由于扁尖尖状器的制作及加工不同于三棱尖状器,使二面留有石疤,又加上其器形相对规整,器身相对扁平而薄,故有人将其归入手斧或原手斧。

手斧。手斧常见于欧洲,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一种具有特色的工具。在中国是山西丁村遗址发现后才正式起用这一名称,之后被广泛使用,并出现综合论述<sup>[2]</sup>(第 61 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手斧尚缺乏规范化的界定,所以有关手斧的分类和名称未取得一致的认识,除直呼手斧外,尚还有似手斧形器,似手斧尖状器、尖状器、大尖状器、三棱尖状器、原手斧等。

石核。这种工业的石核数量相当大,根据其上的疤痕分析,主要是采用锤击法剥取石片,鲜见碰砧法和砸击法。这与北京猿人文化主要采用砸击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台面绝大部分以天然的砾石面为台面,人工台面有之,但极少,它多以阴疤为台面,几乎不见修理台面。就台面数量而言,以单台面为主,双台面也有一定量,但多台面极少。石核上的疤痕一般较深,长宽基本相当,打击点清晰,台面与疤痕的夹角一般都不大。另有一类单台面石核与砾石砍砸器极难区分,区分的依据视其阴面与砾石面所形成的边缘是否有加工痕迹,有这些痕迹者则为石器,反之则为石核。

石片。石片数量较少,多为锤击石片,能见到砸击石片,有的报告报道有二击石片,但未见到图。石片上的特征如打击点、半锥体、放射线等均较清晰。就台面而言,一般为天然台面,有疤台面、修理台面者较少,在郧县人遗址中主要是天然台面,也有露台面的报道<sup>[1]</sup>(第 130、160 页),但不见有疤台面、修理台

面的石片。

### 三、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的总体特征

旧石器时代南方砾石工业分布非常广,所以我们所说的总体特征,也只是相对的,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

1. 埋藏环境。一般处于河流的2—4级阶地的网纹红土层中,绝大多数属于坡状堆积,有的也发现于平原地区,如湖南澧县北部地区和湖北的江陵鸡公山。洞穴堆积所占的比例较少。由于这种网纹红土是一种酸性土壤不便于动物骨骼的保存,所以在这些堆积中绝大多数没有伴生的动物化石出土。

2. 石材。几乎全部原料来自河滩砾石,石质在汉水上中游地区和珠江上游的百色区以石英岩为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以粉红色砂岩为主,但同区的湖北则与其它二区相似。除主要原料外,三个区域都有一定量的石英、黑色硅质岩、火山岩和极少量的燧石。

3. 石器。第一类工具仅见石锤,很少见到石砧;第二类工具依次为砍砸器(砾石砍砸器、石片砍砸器、石核砍砸器)、石球、尖状器、刮削器、手斧形器、盘状器和半月形器,半月形器主要见之于湖南。各种石器器形普遍偏大,一般长度在100MM以上,在40MM以下者极少见,砍砸器中砾石砍砸器是最多的器形,它所占的比例要远高于其它类型的石器,在湖南澧水则以砾石砍砸器和石片砍砸器基本等同的情况出现。各种石器大多保留砾石面。

4. 打片技术。采用锤击法,偶见碰砧法尚未见到特征明确的两击石核(砸击法石片)。石核以单台面为主,双台面次之,多台面极少见到。人工台面极少,有少量有疤台面,这种情况一般是转向打击而成,几乎不见修理(预制)台面。石片角较大,石核的利用率较低。

5. 加工方法。基本上是采用锤击法,以单向加工为要,双向加工居于次要地位。单向加工者主要是正向加工,反向加工较少;双向加工者多为交互加工,次为错向加工,不见复向加工。砍砸器的刃缘一般较曲折,刮削器相对平直。

综观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其石器的制作及加工,总的来说显得粗犷简单,表现出一种原始、古拙的风格,尤其是砾石砍砸器更是如此。

### 四、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的时间跨度

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基本上分布于以上几个区域的河流两岸的网纹红土堆中,由于很少有伴生动物化石出土,加之绝大多数的石制品采集于地表,故对其相对时间的确立困难较大,当然,我们根据各地考古部门公布的发掘报告、简报也可推测出相对的年代,本文作简略的讨论。

长江中下游地区:该区的砾石工业只有湖北二个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动物化石可作参考。其一,是大冶石头遗址。该遗址所出土的动物化石第三纪残留种和中更新世早期的典型种属,但出现了中国鬣狗,所以该遗址可定为中更新世,据铀系法测年为28.4万年<sup>[3]</sup>(第183页),故其时代可定为旧石器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其二,枝城九道河遗址。该遗址有动物化石10余种<sup>[4]</sup>(第6页),基本成员与石龙头相似,所不同的是,石龙头有中国鬣狗,而九道河则为最后鬣狗。最后鬣狗是晚更新世的典型化石,所以九道河的时代相对较晚,可定为旧石器中期。

湖南砾石工业的时代因缺少动物化石只能根据河流阶地来确立<sup>[5]</sup>(第1-12页)。该省已发掘的简报材料基本都是出土于湘、资、沅、澧四条水系的1—4级阶地。根据研究,4、3级阶地所含的石工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2、1级阶地为中、晚期。这种研究虽缺少动物化石来予以支持,但也有其科学性。

上述长江中游区的两湖地区砾石工业的上限时代可定为中更新世,考古学时代为旧石器早期。长江区的下限时间应为更新世晚期,考古学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代表遗址为湖北江陵鸡公山。该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人类活动遗迹,它可分为上、下二层。上层以石片石器为主,是一种器型相对较小的石工业,而下层则为典型的具有南方传统的砾石工业。该遗址的上层文化与鄂西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房县樟脑洞、丹江石鼓的文化面貌相同。下层文化与汉水二级阶地的旧

石器中期遗址相同,这种情况是耐人寻味的,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为砾石工业,晚段为石片工业。

湖南与湖北江陵鸡公山有所不同,即这种砾石工业一直延续到晚期或末期,如澧县的宋家溪遗址。该遗址出土有砍砸器、盘状器、半月形器等其它砾石工业的典型石器,同时也出土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石斧,发现者认为其时代为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的遗物。又有学者在研究彭头山文化时发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八、九千年)这种文化存在大量打制石器,这些石器无论是原料,还是加工方法都与该地区旧石器文化有密切关系<sup>9</sup>(第 81-104 页)。综上所述,长江区的砾石工业从旧石器一直到末期,甚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也能看到砾石工业的印迹。

汉水上中游地区:该区通过科学发掘的有三处遗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动物化石。其一,郧县猿人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动物群共有 21 个成员,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三纪残存种,如嵌齿象、更新世早期的桑氏鬣狗等;但更主要的还是现生种。该动物群成员属华南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由于嵌齿象、桑氏鬣狗的存在显示出该动物群的古老性,时代应为中更新世早期。其二,郧西猿人动物群。该动物群不见第三纪残留种和更新世早期的典型种属,相反出现了中国鬣狗,故其时代较郧县人动物群晚。其三,郧县人动物群。郧县人动物群亦有 20 余个种属<sup>7</sup>(第 104 页),其中有较早的桑氏鬣狗、巨獭、小猪、蓝田金丝猴等,所以这个动物群的时代与郧县猿人的时代基本相当或略早。以上三个地点均出土有石制品,所以这些石制品的时代应与此同时,当为更新世中期。由于郧县人遗址处于汉水四级阶地(有学者认为是三级阶地)<sup>8</sup>(第 231 页),同处汉水三级阶地的旧石器地点较多,时代为中更新世,故凡出土于三级阶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其时代应为同时期。陕西的情况与湖北基本相同。根据上述材料基本可以判定汉水流域的砾石工业遗存上限为更新世中期,考古学时代为旧石器早期。

这一地区砾石工业的下限时代应为晚更新世之前。因在鄂西北丹江口市的石鼓张家营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sup>9</sup>(第 1 页),该遗址的动物群不见更新世中期的成员,相反均为现生种,发现者虽认为其属于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但这批石制品颇具进步性,找不出与砾石工业相同的因素,所以有人认为其时代为旧石器晚期<sup>10</sup>(第 9-12 页)。另外,房县樟脑洞遗址的动物群与其基本相同,其时代为更新世末期,绝对年代为  $13490 \pm 150$ <sup>[11]</sup>(第 298 页)。这二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完全不同于砾石工业的特征,应属于二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我们认为汉水区的砾石工业尚未进入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晚期之前就已消失。但在旧石器中期依然存在,因一般处于汉水的二级阶地,文化面貌与早期大同小异。综上所述,汉水流域的砾石工业存在于中更新世,进入晚更新世就已消失,考古学时代为旧石器早、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不见。

珠江上游地区:该区首先发现这种砾石工业时人们将其时代定为晚更新世,考古学时代为旧石器晚期,之后,其它的发现基本沿用了这种说法,随工作的深入,就时代问题发生了一些改变。现在基本认为此类遗存的上限年代为中更新世<sup>[12]</sup>(第 95-101 页),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又根据热释光测定其年代为距今 46—50 万年<sup>[13]</sup>(第 9 页)。至于下限年代尚无更多的材料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在百色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大量出土打制石器,这些石器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砾石工业基本相似,尤其是尖状器更是如此,这是否可以说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呢?现在材料还不是特别丰富,在此我们仅推测该地区砾石工业存在的时间应与长江区基本相同,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 五、结 语

中国北方大石片工业文化是以北京猿人和泥河湾等遗址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为代表的,这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就是大石片石器文化的观念。所以,当在汉江上中游的蓝田猿人遗址发现砾石工业的旧石器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70 年代在湖北的大冶石龙头遗址又发现了砾石工业遗存,但考古界对其的认识是:长江边上的粗糙文化。近年来两湖、两广、安徽及陕西的南部地区发现大量这样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的南方大片区域存在着一种有别于北方大石片工业的旧石器文化。这二支完全不同的文化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完整体系。

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由于发现的时间较晚,重要的发现也不多,加之所发现的材料多系采集品且很零散,又因所公布的材料测量、统计、分类工作都做得不很完整,故考古学界对其认识还未达到相应的高度,专题文章更少,笔者就已有的考古资料进行推断,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的下限时间问题。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在汉水流域最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结束,具体地点有湖北丹江口市的石鼓、房县樟脑洞和陕西腰市盆地等诸地点,均不见砾石工业遗存,而在长江中游的江陵鸡公山遗址,其上层属石片工业遗存,而下层为典型的砾石工业遗存,时代同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湖南这一时期几乎都是砾石工业遗存,进入东南沿海其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多具有砾石工业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砾石工业从西向东逐渐消失的表现。

其二,旧石器时代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是否存在这种砾石工业?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岭南地区调查时发现,该地区存在一个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演化的过渡时期,其“打制石器全为砾石石器”<sup>[14]</sup>(第63-73页)。这类遗址有广东阳春独石仔、黄岩洞等遗址,这是否预示着这一区域在旧石器时代也存在砾石工业,我们设想这一区域是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冲积平原,由于长期冲积使古文化遗存深埋于地下的可能性是有的,当然这些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来佐证。

其三,旧石器时代南方砾石工业存在的时间之长,分布区域之广,在中国已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圈,它的特征不可能是同一的,证如湖南学者已将该省的这类遗存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sup>[10]</sup>(第1-12页)。这种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我们认为作为专业机构应设立一个课题组,进行全面系统的田野发掘和调查工作,再进行综合研究。

其四,旧石器时代在中国南方砾石工业中发现了一些手斧,这种石器在欧洲旧石器文化中非常常见,在东南亚之越南的度山<sup>[15]</sup>(第69-106页)、泰国<sup>[15]</sup>(第1-68页)也存在着与其形态基本相似且制作方法并不完全相同的石器,从文化角度而言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某些联系。

#### [参 考 文 献]

- [ 1 ] 李天元:《郧县人》,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 [ 2 ] 黄慰文:《中国的手斧》,载《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
- [ 3 ] 原思训、陈铁梅、高世君:《华南若干旧石器时代地点的铀系年代》,载《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2期。
- [ 4 ] 李天元:《湖北枝城九道河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 [ 5 ] 袁家荣:《略谈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 [ 6 ] 裴安平:《彭头山文化初论》,载《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 [ 7 ] 李天元、王正华、李文森等:《湖北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骨的形态特征及其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载《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2期。
- [ 8 ] 黄学诗、郑绍华、李超荣等:《丹江库区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与意义》,载《古脊椎动物学报》1996年第2期。
- [ 9 ] 李天元、高波、陈刚毅:《丹江口市石鼓后山坡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载《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 [ 10 ] 刘华才:《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 11 ] 黄万波、徐晓风、李天元:《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4期。
- [ 12 ] 黄慰文、刘源、李超荣等:《百色旧石器的时代问题》,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 [ 13 ] 曾祥旺:《牛坪坡旧石器材料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 [ 14 ] 张镇洪:《华南地区中石器文化特点初探》,载《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 [ 15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